

溯游抗战重庆丛书
SUYOU KANGZHAN
CHONGQING
CONGSHU

探寻

陪都名人旧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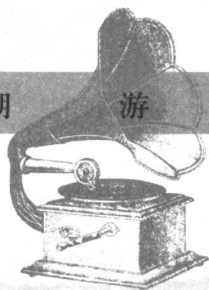
TANXUN PEIDU MINGREN JIUJU 捌

抗战时的名人旧居，蕴藏着一段丰厚的历史。名人的足迹、成就和辉煌，名人的忧愁、窘困和悲愤，都可在名人旧居里追寻。本书带您走进这一切。

杨 筱 著

 重庆出版社

溯 游 抗 战 重 庆 丛 书



探寻陪都名人旧居

TANXUN PEIDU MINGREN JIUJU

杨 筱 著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探寻陪都名人旧居 / 杨筱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5

(溯游抗战重庆丛书 / 蓝锡麟主编)

ISBN 7-5366-7038-9

I. 探... II. 杨... III. 名人—故居—重庆市—1937—
1945 IV. K878.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0075 号

总策划 周永健 郭 宜

溯

游

抗

战

重

庆

丛

书



探寻陪都名人旧居

TANKUN PEIDU MINGREN JIUJU

总 主 编 蓝锡麟
分卷主编 王川平
分卷副主编 张荣祥
著 者 杨 筱

责任编辑 郭 宜 郑文武
封面设计 郭 宜 未 山
版式设计 郭 宜 未 山 赵艳华
责任校对 温雪梅
出版发行 重庆出版社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3.25
印 刷 重庆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次
印 数 1—8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ISBN 7-5366-7038-9/K · 386

邮 购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重庆出版社发行公司





纪念抗日战争 胜利 60 周年

这是一段历史 历史不能忘记



总序 PREFACE

《溯游抗战重庆丛书》

S Y K Z C Q C S

○ 蓝锡麟



山雄，渝水劲，相与托起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重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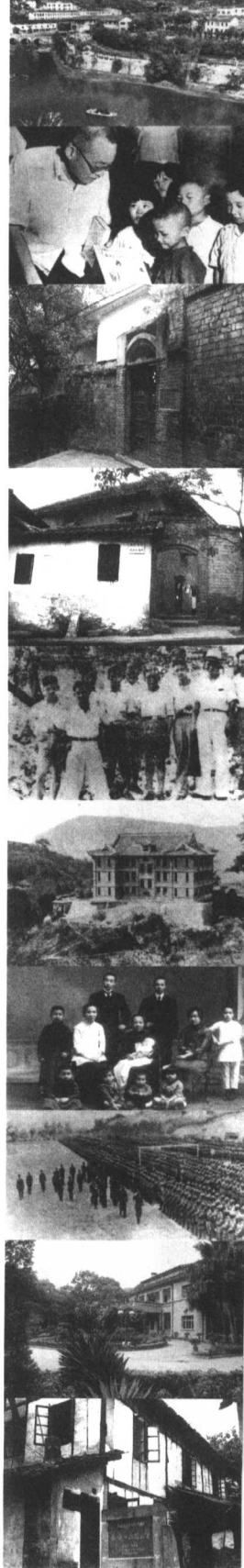
聚众成邑，重庆巍然屹立在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已经历了大约3000年，它在古代所穿越的最壮烈的岁月当数南宋末年的钓鱼城保卫战，那么，它在近代所创造的最辉煌的历史，就非抗日战争时期莫属。而且后者较之于前者，意义更加重大得多，影响也更加深远得多。

那段时间内，重庆有史以来第一次，迄今仍是惟一一次成为全中国的政治中心。1937年11月20日，时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重庆代替南京成了中国的战时首都。历时8年又5个半月，直到1946年5月5日还都南京，重庆的这一地位方告结束。这期间，1940年9月6日所发布的另一道《国民政府令》，

又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历时9年2个月又24天，直到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进占重庆，重庆的这一地位方告终止。战时首都和永久陪都，两个概念虽有关联，并非同一，不能笼统称陪都。像这样既是首都又是陪都，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没有第二座城市可以比肩，重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作用也没有第二座城市可以代替。

与此相应，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又是大后方的军事指挥中心和经济中心，而且包括第十八集团军在内的各个集团军都在重庆设有办事处。经济上，以兵器工业为中心，以重型工业为重点，内迁至渝的企业多达243家，占到全国内迁企业的54%，全川内迁企业的93%，商业、金融、交通运输乃至对外贸易都举足轻重。文化上，全国一流的教育、文艺、新闻出版和科学技术机构及人才大量荟萃于重庆，其盛况不仅前所未有，而且后亦无二。1942年1月3日以降重庆进一步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远东战区指挥中心，并因之而声名远播。五大中心集于一城，无论对中国，对世界，重庆在那段时期作出的贡献和牺牲，都是与其地位和作用相匹配的。

那段时间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尚未取得全国的执政地位，但它始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始终高扬民族大义，始终维护和推进国共第二次合作，全力充当了民族解放的中流砥柱。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立足重庆，放眼全局，坚苦卓绝，从容应对，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曾家岩周公馆，化龙桥红岩村，以及新华日报社，不愧为雾都明灯，长期在抗战重庆闪耀夺目的光辉。几乎在关乎持久抗战的所有领域，尤其





在政治、文化方面，周恩来和南方局所发挥的特殊作用都是无与伦比的。这种作用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共两党重庆谈判，达到光辉的极致。正是在那样的历程中，红岩精神播种、生根、开花、结果了。

也正是在那一时期，重庆这座城市，历史性地实现了一次质的大飞跃。由于被遴定为抗战时期的临时首都，它从一个省辖乙种市，一跃而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随着战时内迁移民的大量涌入，它从一个1927年只有27万人的中等城市，一跃而演变为1945年达到126万人的大型城市，在全国仅次于上海、天津、北平、南京、沈阳、广州位居第七，在西部则位居第一。它从一个长江上游的内陆商埠，一跃而博得了国际知名度，与南京、上海、北平并列为四而出现在联合国成立初期的世界地图上。它作为一个现代化大都市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基础，同样是在那一时期打下的。存在作用于意识，自兹以降，重庆人的现代化大都市诉求变得十分高涨。

可以说，抗日战争时期磨练了重庆城和重庆人，也塑造了重庆城和重庆人。除了前述诸端，素以码头文化著称的重庆人，在那大敌当前、国难当头的峥嵘岁月里，人格和人性的魅力集中彰显出来。大局为重、团结御侮的民族气节，舍身报国、毁家纾难的侠义气概，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共度艰危、志在必胜的坚强毅力，既光大于仁人志士，亦普注于贩夫走卒。即便日本侵略者的无区别轰炸持续了五年之多，也未吓倒重庆人，致令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1942年6月24日由衷称赞道：“足以象征中国不屈不挠意志与决心之重庆，乃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名词。”正是这种共具普适的人格、人格魅力，为红岩精神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当时、现在、将来，无不构成重庆人的精神主流。

所有这一切，共同积淀而形成文化，一部分学者将其命名为“陪都文化”或者“抗战陪都文化”。命名是否妥当，容或尚有商讨余地，但在抗战重庆形成了文化积淀却是不争的事实。决不能泥于北京的皇城文化、西安的旧都文化……历经了几百年上千年才积淀而成，而对这一事实持怀疑态度。历史唯物主义毕竟既承认缓慢的渐变，又承认急剧的突变，以至产生质的飞跃；抗战重庆就实现了质的飞跃，并且这种飞跃有重庆将近3000年的人文积淀的渐变作为潜在的基因。“抗战陪都文化”的精气神不仅流注于当今重庆人的思维和行为中，而且，大量迄今犹存的抗战名人遗事、抗战陪都遗址（其中重要遗址多达二百余处）……无不在作着显证。提不提“陪都”并不要紧，关键是要研究，要珍惜。研究和珍惜，才有可能承传和发扬。

组织编写《溯游抗战重庆丛书》，研究虽还谈不上，珍惜却不言而喻。全套10本书，每本各从一个角度，切入一个层面的历史事件、文化活动、名人故事或者风物人情，纪实性地回溯扫描，不求其全，惟求其真。采用图文相济的形式，意在借文字深拓时空，凭图像便利直观，增强可看性。若读者能够从中看到抗战时期巴山的一丛小树，渝水的一簇浪花，那么，无论是由之获得文史钩沉和思想启迪，还是仅止有助于怀旧游览或阅读愉悦，无疑就算编者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

2004年7月5日于重庆淡水轩



重庆的地气与人文

○ 杨 筱

C Q D D Q Y R W

关于重庆地志面貌的主要史籍有：晋常璩《华阳国志》，宋邵桂子《雪舟胜语》、《新元史》、《宋史》，清王尔鉴《巴县志》，民国宋育仁《四川通志》等。除了王尔鉴的《巴县志》，其余不过是一些零星记载，或者顺便提到，没有专门性地去著述。

那么，在以上的这些稀少的讲述中，怎么也不能忽略、不能不想到清乾隆年间巴县知县王尔鉴。他说：“巴渝郡县百余年无志。”由他主撰《巴县志》的时候，工作是艰苦的。此后关于重庆城市地志上的一切记述，都是以他的《巴县志》为蓝本的。

王尔鉴，字熊锋，河南人，清朝雍正年间进士，乾隆年间巴县知县。

王尔鉴政声清廉，擅长文教，主撰《巴县志》10年，终于第一次清楚地把古代重庆城廓的面貌复原和重建出来，主持绘图并记载了古城街道、沟渠、桥梁、驿站等市政设施情况。据他记载，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城廓的规建终于完全成熟了。

清《巴县志》记述，17门顺时针方向，一开门一闭门交错排列为：朝天门、翠微门、东水门、太安门、太平门、人和门、储奇门、金紫门、凤凰门、南纪门、金汤门、通远门、定远门、临江门、洪崖门、千厮门、西水门。其中储奇门和金紫门相连两座开门。行政区划为城边一圈随之划分为17坊，城中心划分12坊，依次为：太平、宣化、巴字、东水、翠微、朝天、金沙、西水、千厮、治平、崇因、华光、洪崖、临江、定远、杨柳、神仙、渝中、莲花、通远、金汤、双烈、太善、南纪、凤凰、灵璧、金紫、储奇、人和，共29坊。城外沿江附郭15厢，依次为太平、太安、东水、丰碑、朝天、西水、千厮、洪崖、临江、定远、望江、南纪、金紫、储奇、人和，也大体依各城门命名。

那八个闭门没有实用，也干脆没有门，只是用于表达阴阳八卦的建城理念。另外九座开门，面向陆地的只有远在城西的一座开门，叫做通远门，门外是千百年荒坟累积的“官山”。另外八个开门一衣带水，濒临两条江水，只有千厮门和临江门濒临嘉陵江，其余六个开门，都是面向长江。也就是说，城门主要在长江边上。居住在城里的人，都经由水边的城门，尤其是长江边上的城门外边的码头，外出交流和贸易。

宋、元，这里都称重庆路，明清称重庆府。1911年辛亥革命，称为蜀军政府，1913年北洋政府改为川东道巴县。历朝历代，太平坊历来都是最重要的社区。中心有白象街，附近的四方街，是南方市场常见的名字，可见商业云集，重庆市民亲热这一带，所有重要的官府衙门都在这一带，是传统的凝聚力所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直到抗战时期新迁来的国民政府，不再执着于历史中这一片陈旧熟悉的温柔视野，才推开这种重庆人的传统感情，改变了重庆人喜欢把一切钟爱之物放在下半城沿线太平门和朝天门之间的爱好，把新市区铺向上半城濒嘉陵江边和通远门以外。

以上的轮廓，是抗战时期全国在重庆生活的地气（地方气质）、物产（经济生活）、人文（民俗）的一个遥远背景。从而在这上面，才建

立起抗战名人的流亡生活。

根据王尔鉴记述，乾隆时代重庆城区有街、道、路、巷 240 条；大致稍后的《增广重庆地輿全图》记载了 277 条；抗战时期，新修、扩建、合并、整改的街道很多，更由于日机狂轰滥炸，街道变动很大，到 1949 年统计，定型下来一共有 547 条。

民国 23 年（1934 年），沿袭明清厢坊制，全城包括南岸、江北，共划分为 22 坊。城内 10 坊，分为 10 个警察署，依序数命名，不再保留古代的地名。

抗战时期调整划分为依序数的 7 个区，按警察署驻地分列为：

第一区，驻龙王庙，辖区约等于今小什字一片；

第二区，驻桂花坊，辖区约等于今解放碑一片；

第三区，驻段牌坊，辖区约等于今太平门一片；

第四区，驻观音岩，辖区约等于今七星岗一片；

第五区，驻石板坡，辖区约等于今南区马路一片；

第六区，驻张家花园，辖区约等于今北区马路一片；

第七区，驻上清寺，辖区约等于今上清寺到两路口。

其中第三区，属于下半城；第一区和第二区属于上半城；第四、五、六、七区，全都属于新市区。按这个大致印象可以看出，抗战时期新来的陪都人，已将生活的兴趣和视野推向更新的上半城和以外的新市区。此外的新区布满整个重庆城市的版图：

第八区，驻化龙桥，佛图关、黄沙溪、化龙桥整个半岛西段的脖子处；

第九区，驻米亭子，今江北城五里店一片；

第十区，驻相国寺，今江北刘家台一片，1946 年将观音桥镇划进来；

第十一区，驻龙门浩，今南坪以外南岸一片，1944 年分成东西两片，划出第十八区，十一区驻龙门上浩，管较西段，十八区驻弹子石，

管较东段；

第十二区，驻南坪场，辖区约等于今南坪附近地区；

第十三区，驻歌乐山，辖区约等于今山洞到上桥一片；

第十四区，驻磁器口，辖区约等于今沙坪坝一片；

第十五区，驻黄桷埡，辖区约等于今南山一片；

第十六区，驻寸滩，辖区约等于今溉澜溪一片；

第十七区，驻石桥铺，辖区约等于今石桥铺一片；

水上区，包括朝天门、千厮门、相国寺、弹子石、海棠溪、黄沙溪、磁器口等各大小码头。1946年这一区划被取消，各归其陆上附近区域管理。

以上大概就是陪都人当年活动的范围了。大家都知道，重庆是由两条江水，夹着一座叫做金紫山的主峰，生长起来的一座山城。人们主要是从水道上的交通，来达成与重庆的交流和贸易。人们乘船抵达时，总是首先仰望到重重叠叠的房子累砌在窄窄的山路两边，屋前有一块小小的地坪，晾晒衣物，摆放着水桶和木盆、小板凳，小孩子玩耍，大人们劳作、谈天、乘凉，那个空间显得空洞而又充实，显现着在川东山水中，由日月孕育的一种苍凉的哲学。那是一种似乎安然，其中却蕴涵着荒野而极为贫困生活的内容。

1936年的春天，是一个极其安详、安宁和安静的春天。永远也不再会有声音的，却是令人不安的，那就是路倒。他们在春寒料峭的夜里，在人们的安静的睡眠中，在长久的失业和饥饿、失去在人世的所有快乐、信心、温暖和睡眠之后，把被终结的生命的躯壳，温顺而安静地放在城市的阶梯上，小巷里，大门旁边，放在任意一个终结性的地点上，就悄悄地离开了。路倒是由于1936年春旱的大饥荒造成的。

那一年，重庆居民从20几万陡涨到47万人，有十几万周围区县受灾的饥民涌入重庆，安静地盘桓在饥饿的城市里。警察局从浩大的无业贫民人群里，雇佣了一个新的工种，就是清理尸体的人，在路倒苍白如

灰的脸上，再抹上一层石灰，把粉白的脸朝上反架在背上，干枯的如同铁的树枝一般黑色的手，勾人地抓到了淑女和先生们的手上。背尸体的人们头上的白帕子被汗水蒸得湿润，冒着袅袅的热气，踉跄走下长梯，拖着背面的死者像捆束枯柴，好像一生一死的一个双面体一样，从长长的天官府到马蹄街、十八梯、二十梯，从通远门以下的大小什字、大小梁子、杨柳街磁器街各个街区运到各条河街、各个旧城门外的米码头、盐码头、粪码头、棉花码头、油码头、纸码头、煤炭码头和皮货药材码头，从长长的水面，安静地运出城外。那一年，在城区所有的街巷里，在路面、明沟、街檐下和门洞里，到处都窜动着吃死尸喂胖的老鼠、被饥饿和痛苦喂养得柴一样的瘦子，和不再哭泣说话的路倒。这里呈现出一个未来新陪都建立的城市基础，新陪都人也许是带着新鲜的热情来的，但是看见新的生活离得很远啊，而真实的生活安静而悲怆地陪伴着人们，就要和所有的人们一起迎接陪都时代来临了。走进陪都的新闻小姐们，最初惊讶地在报纸上大叫，重庆城里，有著名的三多：死人子多、耗子多、瘦子多。她们说，在破烂的小街旁边，一个简陋的棚屋，里面随便架起竹板，扔两条破絮，就是旅馆啦；门外的大锅里，总是久久地咕咚翻滚熬煮着已经发白的猪骨头，还要树立一个大牌子：“饭馆”、“开堂”。她们说，这哪里能叫做饭馆，而且既然白天明明营业，就不必书写什么“开堂”。

总之，重庆人的努力，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土气、可笑和不得体。这个骨瘦如柴的城市，支持着陪都人的蔬菜、水、肉、米、油、纸、书和戏剧、文学、版画，支持着远东战场中心的大轰炸，用枯黑的瘦手一片石头一片石头地挖出了防空洞。

战时重庆来了很多从长江中下游以及沿海和北方逃难来到重庆的难民，重庆人不管那么多，一律把他们称为“下江人”。有时还很随便而亲切地叫他们做“脚底下人”。其实这是由愚昧无文化的重庆水手传递给全社会的一个观念，一个以重庆为中心点产生的关于方位的感性概

念，但是让外来的人们很不舒服。两边摩擦和隔阂重重叠叠，吵架、打架，不知道多少回。下江城市都是很宽的马路，重庆最宽的都邮街只容得下一辆私人汽车，只有开到较场口才能转弯，第二辆汽车就容不下。这是下江人第一个不习惯。

重庆的人民生活很苦，船工都娶不到婆娘。招考普通工，都是当苦力的，叫他们抬连二石跑好多米，就可以够格了。他们平常在江边街上小店里喝点冷酒，就是沿江篾席搭的棚棚，点着小马灯。下江人叫他们“铁脚豆腐脑”，脚下穿麻窝，垫着谷草，冬天很热和；裤脚很大，里面穿着包脚的布，放下来看不见，可以卷起来好做事。很多人四季光着脚，经常看见冬天脚上流着血和脓。头上却很怕冷，捆着白布，那长长的白布包头，可以当毛巾洗脸，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又可以盖在身上取暖，当很多用途。但擦汗是舍不得用包头布的，用小篾条子卷起来成小圈，刮额上的汗，倒着刮腿上的汗，刮得很干净。

当时重庆的百姓，除了知识分子和在洋务行业做事的人，几乎都是包着白色的长头帕子，形成一个很大的白色圆盘顶在头顶上，似乎是发出脏和怪味的总来源。那是由于长江河谷过于充沛的大气水分形成低气压，男人妇女，自古以来就在头上包裹长长的布包头，穿自家手工做的长布衫，腰间系上绳索，抵御砭骨的阴冷和潮湿。这套服饰是在相对封闭的内陆山地中，重庆人民在长久历史和人文地理以及气候中形成的文化人类学特征。关于下江人第一讨厌的重庆人的白包头帕子，是这里成年已婚男女的标志性服饰。在外来人看，这几乎是一种野蛮和异类的标志，给予他们心理感受相当强烈的抵触。

重庆人不知道吃番茄和牛肉炖汤，却喜欢吃猪油和泡菜，抽气味强烈的叶子烟。从朝天门走到都邮街还有人，刚刚走出关帝庙（今建设公寓），到通远门的大街上就稀稀拉拉，没有人烟了。这些是抗战时期来渝的人们，给予当时重庆风貌的描述。

传统重庆的民居，大都是木结构，屋架是穿斗式。进入城区以后，

主要街道的民宅较多沿用宫殿式，左右对称，按不同规模，按单数分为长三、五、七间，也有双数递进的。还有按这种格式一连二、三、四甚至五进的大院落。这是主城的建筑面貌，不可与从江面上看见的在城外沿着山势“重屋累居”的“捆绑”式所谓“吊脚楼”混淆。

近代以后，城里进入了一些西方样式的房子，大多是砖结构。

抗战时期，很多外来的移民和难民，比重庆人显贵，新盖的房子却不能完全体现出富贵，很少采用砖柱砖墙，而是采用砖柱土墙，或砖柱竹片夹壁墙。但是作为建筑样式，采用的还是西式，有的高达几层楼，下面却只有一个很小的天井，几十家人拥挤地住在里面，共用很小很少的厕所，天井里一两个水龙头，也是几十家人共用。

然后就是充斥各处的“捆绑房子”，用废弃的铁丝、电线，捆绑木板、甚至纸板造成房子，暂时栖身。这种房子的造价成本，甚至低至1—2元。下江人说，印象很不好，很落后，棚棚屋，住在里面响得很。开发得不好，来看到重庆就不大喜欢。但这是由于突然聚集了那么多外来人口造成的，这种像吊脚楼一样的简易房子以前城里是没有的。

其实原来所谓“吊脚楼”也并不是那么浪漫，是一种社会区别，建造在城外附郭的厢里，规定水手、挑水夫、卖药的、唱戏的、娼妓等无业人员住的棚户区。战前重庆47万人，挑水夫就有2万人，水运行业及其家属有20万人，还有1936年春天大旱，从附近涌入十几万流民呢。所以从城外江边上，仿佛都是层层叠叠的吊脚楼。

还需要说明一下，当年的重庆城市里面，是没有下水管道系统的。

清代规定，像都邮街那样的大街，有十尺宽，中等的街道四五尺宽，那么普通的街道窄到何等地步？在老城的街区，两边的屋檐长长地倾斜着伸出来，到街中心留出不到尺宽的一线天隙作为雨溜，街道两边的阶沿下有砖砌的明沟，居民倾倒生活污水。

抗战时期，新建很多街区和街道以及居民区，但仍是这样用排水沟的。

志书上这么写着，全城的污水凭靠着由高到低的地势，“以重力自流方式”往着城外左右两条大江奔泻。古城内共敷设有 16 条傍街行走的大明沟，10 条走外江（长江），6 条走内江（嘉陵江）。如果大雨一段时间，水体的流量超过大水沟的限制，就会将传统旱厕中沤积多年的粪水冲刷出来，几百年里，全城的污水粪秽，当着全城士庶的面前，就这么公然地流着，有记载这套系统大约维持了 400 年了。那么，此前几千年里生活污水是怎么处理的，想来那时人口少，随地处理，城市功能远不完备，生活辛苦啊。

1946 年，三益事务所的工程师罗竟忠，担任重庆陪都建设委员会委员兼市下水道工程处主任，设计建成合流制新式沟管下水道系统，被认为在中国堪称创举。

从那以后，我们才走在一个干净祥和，看不见污水的放心的城市上面。

在以上滔滔而来的历史往事之后，就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年代，远东战场和世界风云，都凝为短短一瞬，波荡在 1937—1946 年的崎岖坎坷的重庆土地上。